

新华社记者
张桂玉摄
(传真照片)

政法战线也要冲破禁区

王桂五

目前报刊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正以磅礴的气势，冲破一些禁区，为思想理论界以至社会生活带来一派新的生机。同整个思想理论战线比较起来，政法战线还显得比较沉闷。这是不是政法战线没有禁区，不需要冲破呢？当然不是！例如，长期以来，在政法战线上讳言“在适用法律上平等”；讳言“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讳言法律对于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作用（只能讲处理敌我矛盾，不能讲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讳言“一般监督”到讳言“反对违法乱纪”；讳言“律师制度”；讳言“革命人道主义”；甚至一般地讳言“正规法制”、“法制不完备”、“无法可依”等等。仅就这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政法战线上的禁区的确不少。

政法战线不仅有禁区，而且这种禁区由来已久。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发其端，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又被他门加以恶性发展，制造了许多冤案、假案和错案。政法战线的禁区，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把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变成了禁区。例如，“对于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可是从某个时候以来，就变成了禁区，言者有错，甚至有罪，认为这种提法“没有

阶级观点”，是“让反革命和革命一律平等”。这纯属误解或歪曲。这一条法律的真实意义，在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地位，不使任何人处于法律之外，或者高于法律之上；无论何人，只要触犯刑律，都要依法判罪。再如关于“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它的本来意义在于排除外界非法的影响和干扰，保持审判工作的独立性，严格执行法律，依法办事。可是，有人却望文生义，认为既然是只服从法律，就意味着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他们不肯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那么，只服从法律，怎么会变成反党呢？难道党会领导人们制定出反对自己的法律吗？党领导审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要教育司法人员对国家法律负责，不屈服于权势的压力，不徇亲友的私情，不受物质的引诱，执法不阿，大公无私，保证法律的完全执行。而且，法院的审判工作只服从法律，也是只服从无产阶级意志的，以人民利益为归宿，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怎么会成为反对党的领导呢？把这一条法律规定曲解为反对党的领导，实在是奇怪的逻辑！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正是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来判是非，评定功过，奖惩干部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负有重大责任的政法战线来说，它本身又是多么需要民主的生活、讨论问题的风气 and 科

学的态度啊！由于有的人早就在政法战线上设置了禁区，而这些禁区，又是那样适合林彪、“四人帮”的政治需要，于是他们就把这些禁区“接管”过来，加以利用和发展，有的甚至原封不动，作为砸烂公检法的理由和根据。例如：过去我们有的同志曾经把批捕（批准逮捕）、起诉工作指责为“找岔子”、“束缚专政手脚”，“四人帮”及其余党就把批捕、起诉工作说成是“干扰对敌斗争”；过去，我们有的同志把反对违法乱纪指责为“矛头对内”，“四人帮”及其余党一字未改，同样指责为“矛头对内”；过去我们有的同志把对犯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指责为“替犯人说话”，“四人帮”及其余党则把劳改监督歪曲为“阶级投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政法工作上的那些禁区，究竟对谁有利，那些棍子究竟是打在资产阶级身上，还是打在无产阶级身上，不是很清楚了吗？

尽管经过实践的检验，是非已经分明，但有的同志仍然对禁区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必须遵照华国锋同志关于“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指示，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只有这样，政法战线才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国家和法律是互相依存的

肖蔚云

关于加强法制的問題，许多年没有人讲了，人们头脑中没有法的观念，甚至连普通的法律常识都没有。在一九二七年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只有三、四个月的学习期间，还设有《法律常识》这门课。在那样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对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还要开设这样的课，现在建国已经二十九年，我们的各级学校不但不设这样的课，甚至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似乎连法律也可以不要了，有国家就要有法，这本来是一般的常识，现在却也成为问题了。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有国家就要有法，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怎能设想在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不要法律呢？！那种认为有国家可以没有法律的观点，不但违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是广大劳动人民对少数剥削者实行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又怎能不要法律，不重视法律呢？！但是，长期以来，那种不重视法律的观点仍然是百分之九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说：“法律就是政治，哪有什么法律，哪个有这个法、那个法？”谁要讲法律，就说是资产阶级的或者修正主义的观点，就犯了弥天大罪。于是大学法律系的法律课几乎没有了，谁也不敢讲什么法律、研究什么法学了。法学界万马齐

喑，“双百”方针在这里似乎根本不适用。难道我们国家现在真的可以不要法律了吗？不，我们不但要法律，而且还要十分重视法律。虽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同剥削阶级的国家相比，国家的性质变了，但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作为国家的一般特征，并没有改变。在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有千方百计企图复辟，国际上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还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专政工具不但不能削弱，专政机关和法律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否认我国法律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际上就是否认阶级、阶级斗争的存在，就会给野心家、阴谋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以可乘之机。林彪、“四人帮”就是诬蔑我国的法律是“旧法律”，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完全否定它，肆意践踏它，随便抄家，随便抓人，随便杀人，随便打死人，使用种种骇人听闻的法西斯刑具，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遭受巨大的灾难，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难道我们还不应当认真吸取吗？

我们国家需要法律，不但因为要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而且对于人民内部，也不能没有法律。我国的法律告诉广大人民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规定了行动的准则。我国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

是能够自觉遵守法律的；但也有少数人受到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不能自觉遵守法律，甚至违反法律。为了维护革命秩序和人民的利益，对这些人也需要进行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当然这和对敌专政有着原则的区别。

我们国家十分需要法律，还在于我们的国家有一项极其重要的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盗窃国家资财的犯罪分子就必须进行坚决打击。我们要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也必须有完备的法律，特别是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和司法，来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对一切违反这些法律的人和企业进行严肃的法律处理。没有这样的法律的促进和保障，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很难实现的。

有人以为我们国家有党的领导，处理法律案件和刑罚，有党委领导同志就行了，似乎法律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谁要强调法律，谁就是忽视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国家是党领导，法律是党通过国家来制定、修改或废除的。因此，遵守和执行法律，正是为了保证和

有了政策还必须有了法

谷承德

长期以来，在我们法学研究和政法工作实践中，流行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政策就是法，政策就等于法。有了党的政策就行了，法可以不要。我国法制长期处于不完备的状况，和这种观点的影响颇有关系。

党的政策和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党的政策是法的灵魂，法是实现党的政策的有力工具。无论是制定法律，还是实施法律，都必须以党的政策为指导。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党的某些相应的政策，实际上可以起到法的作用。但是这不是说，党的政策就等于法了？显然不是。我们既不能把党的政策和法对立起来，否认它们的联系，也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否认它们的区别。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是人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正如列宁指出的：“意志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列宁全集》第25卷第75页）而党的政策则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法的这些特征。党的政策是由党组织提出和制定的，带有号召性、指导性，贯彻执行时主要靠说服教育，而不是靠国家的强制力。不是所有的党的政策都要制定为法律，都要人人执行的。

正因为党的政策和法有以上不同特征，所以我说，党的政策不等于法。把党的政策和法等同起来，会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既然党的政策不等于法，那么还制定法律干什么呢？已经制定的法律也可以弃之一旁，不用遵守和执行了。多年来，这种“等同论”给国家政治生活，给法学理论研究造成了许多混乱，产生了有害的后果。它成了某些人轻视法的挡箭牌，成了法学理论研究的“禁区”。谁要谈党的政策不等于法，谁就要受到批判，被打棍子，戴帽子，什么“宣扬法律至上”、“鼓吹法律万能”、“反对党的领导”等等大帽子一顶接一顶扣将过来。因此造成大学法律系不研究、不讲授民法、民法，只讲“刑事政策”、“民事政策”，讲法律理论也只能讲“党的领导”、“群众路线”、“为中心工

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党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但是党委某个领导同志的谈话和批示，不是就可以代替某个法律？现在一些司法机关，常常只凭党委某个主管政法工作同志的一句话或一个批示来审批案件，量刑判刑，这既不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利于党的领导。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指以党的路线、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来领导，重大的问题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而领导同志的个人谈话，有时符合法律，有时并不符合法律，甚至是违反法律的，因此不能作为量刑、判刑的标准，不能作为法律。

言和法

梅 鉴

近来读史，有些感想，要说一说。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二卷·《唐纪》八和《旧唐书》的戴胄传里，写着这样一则历史故事：唐太宗曾经认为绞刑、断趾等刑罚太惨，让法官们把律令改一改，法官们遵命改了一种“流役”，太宗下诏颁行。当时唐朝盛行选举，常发生假造资历、诈骗舞弊的事，唐太宗又下令：干这种事而不自首的，要判死刑。不久，竟发现了这样的案件。戴胄当时是大理寺少卿，也就是司法官。于是，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戴胄和唐太宗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旧唐书》戴胄传这样写道：“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死刑，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爽朕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言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乎？’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天下之愤而诛之，孰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愤而存大信也。若顺情违法，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旧唐书》的作者为此称颂道：“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判狱，皆事无冤滥，随方指摘，言如泉涌。”

读这则史料，特别是对于那场争论，感到颇有味道。只要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只要不是一“言九鼎”那套一竿笔掉千年历史的假左真右灰色所惑，便不难看出，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其某些言行，也不乏正直廉洁之处。你看那戴胄对法和法的分析，不是很有一点道理吗？“法者，国家所以



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论罪量刑，是拿当权者因其喜怒哀乐而听而讲的话作根据呢，还是按国家规定的法律为标准呢？这是戴胄和唐太宗争论的中心问题。法是代表整个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的。就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来说，就是代表了一方面要制裁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分子，一方面要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法律。而法和法，是经过国家的专门机关研究、反复试行、郑重颁布的，是谓布于天下下的“大信”。而言和法，可以是一致的，也可以是不一致的。戴胄极力主张据法论断，反对依言照办。他为此大张旗鼓！争得好！而那个唐太宗，终于收回了“杀头”的话，执行了“流放”的法。这也收得好！行得好！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但是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象句县县少数干部那样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象运城地委那样对写信表示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象沈阳市个别交肉民警那样打骂了群众还认为“是一种皮肉教育”；以及象《人民日报》今年八月份刊登的一封信读者来信所讲那批：北京市公安局某某人，对于因神像周周而被抓起来的革命同志，好不容易释放了他们，也还要千方百计给一个留个尾巴……。这一切，固然同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流毒

有关，但是，总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问题推给“四人帮”的流毒吧。象上面列举的那些情况，撇开其它原因不谈，难道其中就没有一个言与法的问题？尽管我们国家的法律还不完善，但是，宪法这个根本大法总是在的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是载入宪法的嘛！宪法里头哪一条叫你强迫命令、打骂群众、打击报复？哪一条叫你恃权忘理、总想耍人抓起来，而且抓了不放、放了还要留尾巴？打开天窗说亮话，干出这些恶来，还不是当官的说一句话算数！掌权的说一句话算数！至少是顶头上司说一句句话算数！

对待一个人，处理一件事，以至断案、量刑，究竟是按照领导人的话去办，还是根据国家法律去办？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有这么一种情况：没有法，领导人的话就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犯法。这种情况，当然不行，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有法不依，而是光凭领导人说的话去处理问题，行不行呢？也不行，也不容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任何领导人的话，都有说得对的，说得不对的。究竟按什么办呢？若是按说得不对的话去办，譬如什么“九一二三事件以反对林彪也是反革命”之类，当然一定不肯给那些早就反“四人帮”的人平反了。就是按那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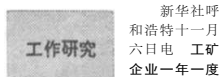
部之口。你张开嘴巴，随便说句把话，即使没有“一言九鼎”之重，也有“一锤定音”之效。正因如此，当你那锤子锤出去时，岂不是很要慎重一点么？正锤到点子上，倒还要了，如若不然，而人们又依了去定音、定调，怎么得了？如果是

军国大事，那就一定陷误军机，大事不好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通过他们来管理国家的代表，总不能连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都不如吧，总应该比他们高明一些吧。那末，无论什么单位，无论什么干部，不管他现任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象毛泽东同志在十六年前所说的那个人情况——第一书记或第一把手那个人说了就算数——总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吧。应该发扬民主，同时要立法，执法，守法。

二十三年前，当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教导大家：“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闹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立法、执法、守法，这不是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而是一种好的革命风尚的树立。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危害之烈，由于上层建筑中封建意识形态的残余之深，看，在今后二十三年的长征路上前进的时候，为了这种好的革命风尚的树立，也需要伴随一场大喊大闹。那就是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的优越性，批判一人称霸和按“长官意志”办事的落后性。

这样开会好



新华社呼和浩特十一月六日电 工矿企业一年一度的“先代会”，开展既节约又生动活泼，这种开法值得借鉴。

怎样开？包头市轻化系统一九七七年度的“先代会”，开展既节约又生动活泼，这种开法值得借鉴。

他们的做法是：会议召开前，局党委首先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节约闹革命”的指示，提高大家对从简开会的认识。会议期间，不住旅馆，不集中就餐，能不集中的议程，就分组到各单位进行；非集中不可的议程，集中半天开会。这样开，好处很多：

第一，四百多人开会四天，不仅节约旅馆费和伙食补助二千多元；而且不租用会议室，不包场看电影，这几项一共可为国家节约近五千元钱。

第二，从简开会，与会无关的活动不安排，基本上不用交通工具，企业生产也不受影响。

第三，在家住宿，减轻了对旅馆的压力，而且没有放弃机关的日常工作。

第四，把会议议程下放到各单位进行，能使会内会外相结合。代表们在会议期间就能够把会议精神及时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去。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今天上午会见了由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部长米歇尔·多尔纳诺率领的法国环境及生活条件代表团。

会见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李先念副总理同法国朋友们就进一步扩大中法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法国驻中国大使克洛德·阿尔诺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李超伯等。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图为李先念副总理同多尔纳诺部长握手。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方副总理会见日中协会学术访华团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六日电 方毅副总理今天下午对日本学术界著名人士说：“对于日本科学工作者愿意同中国方面进行科学技术合作，我们是欢迎的。在这方面，中日两国可以合作的范围很广泛。”

方毅副总理是在会见以日中协会代表召集人、著名物理学家茅诚司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协会学术访

华团时说这番话的。为了加强日中两国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茅诚司团长在这次访华期间曾建议建立日中学术交流中心。

会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方毅副总理同日本朋友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后，如何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和交流的问题，认

真地交换了看法。

参加会见的访华团团员有：日本学院院长和达清夫、日本学术会议会长伏见康治、文部省学术会议会长吉沢雅夫，以及日本学术界其他著名人士伊藤正巳、胜木保次、田村三郎、塚田裕三等。

会见时，中日友协副会长夏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等在座。



方毅副总理会见日本日中协会学术访华团。图为会见时合影。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

圆满结束对非洲七国的访问

耿飚副总理回到昆明

新华社昆明十一月六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圆满结束对刚果、几内亚、马里、加纳、尼日利亚、卢旺达、索马里的访问，于十一月六日晚乘专机回到昆明。

昆明，中共云南省委、省革委会、昆明部队负责人安平生、王必成、刘志坚、李启明、张经秀、赵增益、薛皓、徐其孝、李克忠、李原等到机场迎接。

中国省市负责人访日代表团回到北京

廖承志副委员长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六日电 以安徽省委革命委员会主任万里为团长的中国省市负责人访日代表团，结束了对日本友好访问后，今天下午乘飞机回到北京。到机场欢迎的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联珏，中日友协副会长王芸生，对外友协副会长杨蕴等。日本驻华使馆泉健参赞等外交官员也到机场欢迎。

严明党纪国法 保障群众民主权利

舒兰县严肃处理张公顺等人打击报复事件

本报讯 吉林省舒兰县上营公社马鞍岭大队党总支书记张公顺等人，目无党纪国法，公然私设公堂，殴打写信揭发问题的社员杜存礼，性质严重，情节恶劣。前不久，舒兰县委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并通报全县。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六日，杜存礼给安图县明月镇工商行政管理所写信，揭发马鞍岭二队成立地下包工队，非法在安图县承包水库房屋和轻厂烟囱工程的问题。杜存礼写信前，明月镇有关部门已发现这个包工队是地下黑包工队，决定罚款二千八百元，并把处理情况通知马鞍岭大队党总支。恰好这时，收到了杜存礼的匿名信。

这个包工队，是大队党总支书记张公顺支持的。他知道有人揭发以后，非常恼火，亲自带人跑到明月镇，利用欺瞒手段，把匿名信拿到手。

接着，张公顺又召开总支委员会，确定由他和大队治保主任谭金才负责追查。他们经过对笔迹，怀疑是二队副队长刘新禄所写。刘不承认；又把刘的母

亲张秀兰找到大队追问了一天。从张秀兰提供的线索中，张公顺等人认定，揭发信是杜存礼写的，便把杜找到大队进行审问。杜开始不承认，张、谭气势汹汹地把他绑起来殴打，二队队长刘正森也赶上来打杜的嘴巴。杜存礼承认后，当晚就被看管起来。第二天，张、谭二人又继续进行审讯追问，直到晚上才放杜回家。

今年二月二日晚，张公顺指令第二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批判杜存礼，并同谭金才以及两个党总支副书记亲临坐阵。队长刘正森让杜摘帽低头，杜不服，就恶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会上，二队会计潘学道宣布：张公顺等人去安图的火车费、食宿费二百三十六元，全部由杜存礼负担；没有八百元罚款，也要杜赔偿。杜存礼没有钱，就没收其房子、箱柜等家具。

杜存礼忍无可忍，便于四月二十日，领着全家六口人，到上级领导机关控告。

舒兰县委十分重视这一侵犯公民的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事件，及时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证明杜存礼的揭发完全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六日电 中共中央

纪登奎副总理会见罗马尼亚《火花报》代表团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今天晚上会见由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火花报》总编辑福斯坦丁·米特亚率领的《火花报》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米特列斯库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秦川、李庄等。

《火花报》代表团是在访问重庆、成都、广州、杭州和上海以后，于十一月三日返回北京的。今天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同罗马尼亚同志进行了座谈。代表团将于日内离京回国。



图为会见时情形。

新华社记者 唐理奎摄

李强部长欢宴扎伊尔政府贸易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六日电

外贸部长李强今天晚上举行宴会，欢迎有扎伊尔商业国务委员卡瓦塔·布瓦隆为团长的扎伊尔政府贸易代表团。

扎伊尔驻中国大使图马·瓦库和大使馆外交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李强部长和卡瓦塔·布瓦隆团长在宴会上祝酒。出席宴会作陪的有李强部长的夫人魏环李，外贸部副部长陈洁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

今天下午，李强部长同卡瓦塔·布瓦隆团长举行了会谈。

属实。为了严明党纪国法，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教育干部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县委决定撤销张公顺大队党总支书记职务，留党察看；撤销谭金才大队治保主任职务；对生产队长刘正森，给予严肃的批评教育。对杜存礼不能参加

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容侵犯

杜存礼同志向有关机关揭发他所在生产队地下黑包工的问题，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原马鞍岭大队党总支书记张公顺等人，对杜存礼打击报复，是侵犯公民的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行为。中共舒兰县委给予他们纪律处分，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如此，就不能明法纪，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类似马鞍岭大队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事件，不但一些基层组织有，在一些县以上的领导机关也不时有发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根源之一，是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毫无法纪观念，错误地认为他们所说的话就是法律，听领导的话就是守法，不听领导的话就是违法。对他们所负责的工作，群众和下级不能说半个“不”字，否则，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轻者穿“小鞋”，重者就迫害。他们对群众和下级向上级机关检举揭发他们的错误，更认为是大逆不道，非要以惩治不可。什么党纪国法，什么人民的民主权利，在他们的头脑里根本就不存在。“我就是党”，“我就是政府”，这就是他们的理论，这就是他们的思想方法。群众管这种干部叫“土皇帝”、“土皇帝”、“土皇帝”，不坚决纠正他们那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就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会使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这显然不利于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

干部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的违法乱纪事件，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过，我们党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有意颠倒敌我关系，对干部群众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在他们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和影响之下，一些干部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的违法乱纪事件增多了。经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这类事件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固然有所减少，但在不少地方和单位，仍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必须坚决加以纠正。所以一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如果对侵犯人民民主权利，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就是一种失职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就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违法乱纪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逼供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中，强调了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的重要性。各级党委要继续抓紧抓好落实党中央批示的工作，把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制止违法乱纪、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凡属群众检举干部违法乱纪的事件，领导机关都应当严肃认真地处理，不能漠不关心，更不能官官相护。要选择典型的违法乱纪事件，大张旗鼓地予以处理，坚决打击各种歪风邪气，伸张无产阶级的正气，教育干部、群众人人懂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的极端重要性。群众要守法，党员干部更应该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努力做好这项工作，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是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成都工学院已改为成都科技大学

列为全国重点学校，将新办部分理科和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专业，并逐步扩大研究生名额

新华社成都十一月五日电 为了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成都工学院已改为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并列为全国重点学校。

成都工学院原是一所多学科的工科高等院校，改为成都科技大学后，除积极办好原有工科专业外，将根据需要与原有基础，新办部分理科和新兴学科、

边缘学科的专业，并逐步扩大研究生名额。

目前，学校党委正在积极进行学校的规划工作，并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养和提高，以便经过准备，开出新课。

成都科学技术大学，由中国科学院和四川省双重领导，以中国科学院领导为主。

我国外贸体制中的新芽

——访广交会中国机械设备出口总公司交易团

在一九七八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一个新成立的、实行工贸结合新体制的中国机械设备出口总公司的出现，引起了来自世界各国贸易界人士和朋友、港澳同胞的注意。我们怀着很大的兴趣，来到该公司首次派出的机械设备交易团，访问了该团负责人。

这个公司是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外贸部双重领导下，经营出口一机部生产的机械产品的。现在，直接与客商洽谈贸易的是一机部这个工业生产部门，不再通过其他中间环节。这是在外贸管理体制上进行的的一个改革。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它有什么优越性？交易团的负责人对我们说，“四人帮”横行时，要在外贸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

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是根本办不到的。“四人帮”攻击外贸工作，散布什么“出口是美国”、“进口是崇洋”、“贸易做得越多越反动”等谬论，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外贸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打倒了“四人帮”，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战斗力号召。我们要加快前进的步伐，除了依靠自力更生外，也需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设备。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相应地出口自己的产品换取外汇，使对外贸易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在外贸管理体制上，这几年来虽有一些改进，

但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变化不大，不能适应外贸大发展的新形势。例如，工业生产部门不直接承担出口任务，以产定销，容易造成产销脱节。

机械设备交易团的负责人指出，我们过去的出口商品经过的中间环节很多，生产部门对国际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动向很不清楚，只是按各部下下达的任务办事，而买者对商品有什么意见也不能直接同生产部门商量。因此，工厂生产的出口商品往往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数年来，一机部积压的、不合出口需要的机械制品的数字是很大的。现在实行在工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工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有什么好处？交易团的负责人说，现在仅仅是个开始，我们还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目前可以说，这样做能够生产部门直接了解客商的要求，充分了解国际市场的情况，更好地完成出口任务；新公司既抓生产，又抓出口，有利于以销定产，产销结合。工贸结合的新体制有利于同外国进行技术交流，使生产部门能直接了解我国的机械产品有什么意见也不能直接同生产部门商量。因此，工厂生产的出口商品往往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数年来，一机部积压的、不合出口需要的机械制品的数字是很大的。现在实行在工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生意兴隆的景象。据最近估计，本届广交会开幕以后头半个月机械设备的成交额，已经超过历届交易会这方面的成交额。在这届交易会上，一机部的一位副部长到这里来召开座谈会，征求客商对我国机械设备的意见。生产部门的负责人亲临外贸第一线，了解情况，征求客商和各界人士的意见，以便更好地安排出口生产任务，及时解决问

题，这在广交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生产部门直接工贸结合管理体制，参加承担出口任务，有利于把生意做活，如采取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等国际上通用的贸易做法。当然，在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新的矛盾，这种体制还需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和改革。随着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机械产品的出口贸易必将会迈出更大的步伐。

本报记者 方荣莹 徐德文

行宫座落在湄南河中的小岛上，后来才与岸上相连。翠绿的大树遮掩着好几座宫殿，回桥走廊结连水中石桥的亭榭。栏杆有佛像，也有两翼的安琪儿石像。最著名的要算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水上宫殿，尖塔形的屋顶，别具风格，巍立在水面上，衬着蓝色的天空，白花朵朵，水天一色。这些景物的倒影，映在平静无波的水面上，真是一幅难以描述的美丽图画，令人心旷神怡。

